

秀的错误。他在1926年年末和1927年初已经发表反对陈独秀、彭述之路线的理论小册子。1927年4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。在这大革命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，陈独秀等人并没有担负起责任，而是继续奉行妥协政策。在大会上，瞿秋白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发出了猛烈的攻击。他散发自己写的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》（副标题为《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——中国革命中之孟赛维克主义》），并在大会上对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做了尖锐的批评。

武汉反共，大革命失败，陈独秀下台。中国共产党需要新的领导人。瞿秋白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在“八七”会议上，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，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。中国革命完成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。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，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，领导着全国的革命工作。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片武装起义的斗争怒火。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相继发生，全国各地发生了数百起的武装暴动，罢工游行更是不计其数。

1928年6月，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，这是一次党的总结经验、调整策略和巩固领导核心的大会。瞿秋白的不顾实际、盲目发动暴动的政治路线受到了批评。功过相抵，会后他留在了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。国内革命由李立三实际负责和主持。瞿秋白仍旧留在中央领导层内，但已不是主要领导者。

中国革命的局面仍旧是扑朔迷离，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，党仍旧在徘徊中举步不前。在莫斯科两年之后，1930年8月，瞿秋白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“左倾”错误。1931年1月，瞿秋白纠正错误的“错误”也被纠正，他和李立三一起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。

瞿秋白向中央告假，从此不想再参与政治。他已经心力交瘁。自幼身体就不好，1919年就染上了肺结核。1932年几乎病死。在上海的三年里，贫病交加，居无定所，三次避难躲到鲁迅的家里。在和鲁迅及上海文化界往来的这段日子里，瞿秋白又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和文论。鲁迅先生感怀他的才华和人品，挥笔写下了“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的题词。

1934年1月，瞿秋白拖着患病的身体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。病还没有养好，苏区就沦陷了。1935年2月，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俘虏。之后，毅然就义。

# 江竹筠

## ○临终岁月

1948年1月，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下川东（四川东部万县、云阳、奉节、巫山、巫溪、开县、石柱等大巴山地区）领导农村武装起义，不幸牺牲。丈夫牺牲后，江竹筠战胜悲痛，毅然向重庆党组织申请到下川东农村丈夫工作过的地方去。到了下川东后，敌人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形势非常不利。江竹筠只好留在万县县城进行革命工作。她的社会身份是法院会计室职员。

6月14日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江竹筠不幸被捕。当天晚上，她在中统的万县特委会受到了严刑逼供。一起被捕的还有李青林、黄玉清等12名同志。她们一起被解往重庆行辕二处。在轮船上，政治犯们被两两拷在一起，并排坐着。地下党干部们大多数正气凛然，表情慷慨，只有涂孝文与众不同，不敢与大家照面。发现涂孝文叛变之后，江竹筠思考着如何把这个消息传出去。找到一个机会，她大骂涂孝文：“你这个狗，乱咬人，平白诬赖别人是共产党，你没好下场。”船上很多群众前来围观，无意中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从而避免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损失。

到达重庆之后，江竹筠再次遭到严刑审讯。敌人知道她是彭咏梧的妻子，想要把她作为突破口，获取下川东党组织的情况。中统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亲自审问江竹筠。当班特务搬来老虎凳、吊索、电刑机器、披麻戴孝（有刺钢鞭）、水葫芦、火背兜、撬杠等多种刑具，制造恐怖气氛。最终一无所获。不到一个星期，敌人又对她进行审讯。整整一天，敌人在她的

伤口上继续用刑，甚至往她的手指尖上钉竹签子。但是，他们得到的还是“不知道”三个字。

关押江竹筠的渣滓洞有 16 间男牢，2 间女牢，共 200 多名难友。江竹筠受刑的消息传开之后，各牢房迅速掀起慰问的热潮。小小的罐头、半个烧饼，还有同志们用竹签子、红药水写下的慰问信，都送到了她手中。江竹筠手不能动，请同室难友帮她写了回信。“谢谢同志们的关心。毒刑是太小的考验。筷子是竹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……”她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全牢的同志，他们开始叫她“江姐”。

长期坐牢，有充裕的时间，精神食粮成为最迫切的需要。狱中的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。江姐和其他同志一道默写了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她还凭记忆讲述《土地法大纲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。

同室的曾紫霞因为丈夫有上层社会关系，能够接收到外面寄来的物品。曾因接受东西与看守黄某接触次数较多。江姐和曾紫霞研究了黄某的情况，打算将其从顽固分子中争取过来。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工作，黄某终于转向革命，愿意为她们做事。狱外关系接通了。黄几次送信出狱，还为江姐取来了儿子的照片。

1949 年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西南。国民党一方面负隅顽抗，一方面准备杀害狱中的政治犯。8 月份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布置杀害革命者和其他政治犯。重庆特务头子徐远举制订了杀害 41 名共产党干部和 5 名民革主要成员的计划。10 月份，公开杀害了陈然、成善谋等 10 人。

11 月 14 日上午，特务高叫“江竹筠、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，马上转移。”江姐揣测可能是敌人要杀害她们，但也不能完全断定。她简单梳洗，穿上一件旗袍，向难友点头告别。敌人佯称转移，先将他们 31 人羁押在中美合作所的礼堂。傍晚，继续上路。当他们走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道时，情况就完全明白了。江姐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、“打到反动派”、同行的难友也开始高呼起口号。刽子手吓慌了，还没有走到目的地就射出了子弹。江姐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岗垭。江竹筠终年 29 岁。

## ○临终遗言

### 遗书

——摘自中国革命博物馆编《革命烈士遗书选》

竹安弟：

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，我感到非常难受。么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太重了，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，以你仅有的收入，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。除了伤心而外，就只有恨了……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！苦难的日子快完了，除了希望这样的日子快点到头而外，我什么都不能兑现。安弟，的确太辛苦你了。

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，自入狱日起（去年六月被捕），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，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，年底有出牢的可能。蒋王八的来渝，固然不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，现在战争已近川边，这是事实，重庆在（再）强也不能和平、津、穗相比，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。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，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。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。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。

话又得说回来，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，生死未定。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，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。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，但是并不等于没有。假如不幸的话，云儿就送你了，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

孩子们决不要娇养，粗服淡饭足矣。么姐是否仍在重庆？若在，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，可节省一笔费用，你以为如何？就这样吧，愿我们早日见面。握别。愿你们健康！

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不用怕，盼能坦白相谈。

竹 姐

8月17日

## ○评析

### 一封母亲的托孤信

这封信是江姐在临死前写的一封家书，由难友曾紫霞出狱时带出，转交给了自己的表弟谭竹安，信中为托孤做了准备。三个月后，江姐英勇就义了，她再也没有留下什么遗嘱，这封信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托孤信。

遗书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层，感谢亲人谭竹安对儿子彭云的照顾。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前妻（即幺姐）的弟弟，在重庆《大公报》工作，江姐现在能联系到的唯一亲人就是他了。为了革命工作，江姐和彭咏梧假扮夫妻，日久生情，结婚生子。1946年11月，谭竹安找到彭咏梧。当他知道姐夫再婚时，非常震惊。后来经过彭咏梧、江姐以及党组织的解释工作，谭竹安消释前嫌，谅解了这对革命夫妻。江姐为人坦诚直率，和谭竹安感情越来越好，两人以姐弟相称。1947年年底，彭咏梧、江姐和谭竹安商量由谭竹安和幺姐来抚养孩子，他们二人往下川东进行革命。从此，彭云就算托付给了谭竹安，幺姐来重庆以前，先寄放在战友家里。1948年四五月间，幺姐来到重庆，谭竹安担负起抚养彭炳忠（幺姐生的孩子）和彭云两个孩子的重任。国民党崩溃前夕，经济已经崩溃，城市生活艰难。谭竹安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，情况也非常不好。

第二层意思，表达了对将来革命必胜和自己出狱的信心。江姐在狱中，虽然消息闭塞，但是对于时局和形势有一定的了解。1947年年初，彭咏梧在接到上级指示领导下川东农村武装暴动，推动重庆解放时，她就知道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大为发展了。进监狱后，他们利用狱外关系，对战争发展进程也比较了解。1949年1月，北平解放，4月，解放军进军江南。8月，湖南程潜起义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岌岌可危。因此，江姐对革命胜利充满期待，认为革命胜利后，他们可以出狱。

第三层意思，做牺牲准备。江姐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：敌人穷途

末路，狗急跳墙，有可能杀害狱中的共产党人和政治犯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她就将自己的孩子送给谭竹安，请他抚养孤儿。江姐的政治感觉还是非常敏锐的。在重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特务杀害大批监狱人员。关押在渣滓洞的200多名囚犯在最后一刻也都被集体屠杀。

江姐死后，她的儿子彭云由幺姐抚养。幺姐原名谭政烈，后改名为谭正伦，她对抚养江姐遗子非常负责，曾经为了全力抚养彭云而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。解放后，幺姐长期住在成都，抚养两个孩子成人。江姐的孩子彭云于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1977年，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，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。随后，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，赴美国，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，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。现定居美国，任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。

“孩子不可娇养，粗服淡饭足矣”、“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”，这是江姐对后代的期望。教育孩子继承共产主义志向，教育孩子不要追求个人享受，这也正是江姐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真实体现。她对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太多的关注和照顾，甚至准备好了让他当孤儿。1946年4月彭云出生，一个月后，她就回到四川大学继续读书。离开学校之后，江姐又把孩子托付给别人，自己坚持革命工作。1947年11月，她和丈夫一起离开重庆，到下川东领导革命工作，又将孩子托付给别人。1948年1月，当彭咏梧牺牲之后，她又做了献身革命，将孩子送人的打算。在托孤信中，她对孩子的感情虽然深厚，但是将他送人的口气却异常的坚定和决绝。

江姐的教子名言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者对待后代的普遍态度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，共产主义事业是无比崇高和伟大的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，他们可以奉献一切，包括生命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：干革命就要不怕犯错误、不怕开除党籍、不怕离婚、不怕坐牢、不怕杀头。革命事业高于一切，个人的情感、家庭、婚姻让位于革命事业，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这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了新时代的特征，只要坚持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，个人服从国家，就仍旧是革

命，就仍旧是共产主义精神。

江姐牺牲之后的影响越来越大。1957年，同在渣滓洞监狱关押，后来幸存下来的罗广斌写下回忆录《在烈火中永生》，记述了江姐的事迹。1961年，罗广斌又完成了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影响巨大。1964年，以《红岩》中江姐的英雄事迹为题材编成的歌剧《江姐》，公开上演。此后，这幕歌剧不断上演，迄今已经演出了46年，280多场。随着歌剧、电影的不断宣传，江姐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。

江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刻画了一个基层革命党人的形象。在狱中，她遭受过的刑罚包括用竹筷子夹手指，辣椒水浇伤口，将竹签钉进指尖。相比较酷刑之下多少人投降变节，江姐的意志就更显得可歌可泣。江姐又是一位有知识的革命女性，她的理性和革命斗志的结合，使她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机智、沉着、英勇不屈。一首献给江姐的诗篇，最能说明她的优秀品质：

你是丹娘的化身，

你是苏菲亚的精灵，

不，你就是你——

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。

丹娘是俄国革命的坚强女战士，江姐是中国的丹娘。

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时代，江姐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树立了一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，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革命的影响和鼓舞。

## ○小传

### 英勇不屈的地下革命党

江竹筠，四川自贡人，1920年8月出生于当地农村。父亲名叫江上林，是当地的农户。他在江竹筠姐弟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在外，流浪飘荡。母亲名叫李舜华，是刀石镇上城镇人家的女儿，从小读过几年书。江上林离家之



后，全家靠她一人支撑，她对孩子从小就要求严厉，不准顽皮，让他们参加各种农业劳动。

1928年，家乡发生水灾。李舜华带着江竹筠姐弟俩离开农村，投奔江竹筠在重庆的外婆。在外婆的情面下，一家三口寄居在三舅家，只是舅妈经常给以脸色，有时甚至夺下江竹筠手中的碗筷。外婆去世之后，江竹筠母女就搬离三舅家，自谋生路。1930年，江竹筠和母亲一起进了重庆的一家鞋袜厂，做起了童工。人情的冷暖，生活的艰辛无不磨炼着这个小姑娘。

1932年，在舅舅的帮助下，江竹筠进入当地的一家孤儿院学校，开始读小学。此后，她的求学之路，竟然延续下来。1936年，她进入重庆南岸中学读书，1939年春天，又进入中国公学附中高中部。在学校里，江竹筠异常刻苦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还常常获得奖学金和免学费的待遇。

1938年，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到重庆。各个党派、学校、文化、科研机构也随后迁来。国民党政府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党禁、放松了政治限制，一时间政治、文化等活动在重庆开展起来。江竹筠对下层社会怀着真情实感，这时又受到政治环境和共产党的刊物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以及其他进步刊物的影响，思想上很快觉悟起来。1939年夏天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江竹筠开始做起了国统区的地下党工作。她的身份是学生，于是就在学生中用隐秘的方式开展起宣传和发展党员的活动。1941年秋，江竹筠离开学校，以小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社会。这时，党指派她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，主要职责是单线联系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。在最初的工作中，她慢慢学会了一套地下工作的方法，譬如，言行举止符合社会身份，两人开始接头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；见面的时候准备被逮捕，被捕后两人说法一致；在敌人刑讯中，心要横，口供要少，要一成不变；不暴露身份，要隐蔽在群众之中等。江竹筠工作细致、负责任，从不出风头，而善于用生活上的真情实感打动人，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沉稳老练。

1943年，党组织交给江竹筠新的工作任务。这时，中共南方局决定展开“提高党性”的活动，进行基层地下党的“整风”运动。彭咏梧是重庆市委

委员，他的社会职业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，但是住在单身宿舍里不利于领导整风运动。党组织让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，这样她就成为彭的工作助手。在这期间，江竹筠担负起了市委机关和外界的交通联络任务。

1944年，由于受到特务跟踪，江竹筠离开重庆，来到成都。为了找到合适的社会职业，也为了占领学校工作阵地，江竹筠决定报考成都大学。决心战胜了困难，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，只上过两年高中的她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。9月，江竹筠进入川大。

在川大，江竹筠一边读书，一边为党做工作。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转过来，因此只是以普通学生的身份，做群众工作。在当时川大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，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是焦点。江竹筠找到品行兼优的学生陈光明，陈不愿意多参加活动，认为耽误时间。她就鼓励她，启发她的思想。在江竹筠的帮助下，陈光明先做女生院伙食团的伙食经理，提高她在同学中的威信，第三届自治会选举时，江竹筠又发动大家投她的票，陈光明最后果然当选。江竹筠做工作，大体是这种方式。

1945年上半年，25岁的江竹筠和彭咏梧结婚。1946年，她生了儿子，在做剖腹产时，为了更好地献身革命，一道做了绝育手术。7月，在川大学习两年之后，江竹筠又回到重庆。彭咏梧是重庆市委委员，主管学运及川东一部分地区党组织，因此党组织决定江竹筠留下来做彭的助手。这期间她的主要任务是守护党的机关，负责市外通讯联络。以后，市委机关报《挺进报》创立，她又负责收集《新华社》通讯电稿为报社供稿以及负责报纸的部分发行工作。

早在江竹筠回重庆之前，重庆党组织就决定清理农村党组织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，并为此不断输送干部到农村去。1947年10月，重庆市委决定在农村建立游击队，建立根据地，成立川东临时委员会，由彭咏梧任委员具体领导下川东武装斗争。江竹筠渴望到农村进行武装斗争，于是作为下川东和临委之间的联络员，和丈夫彭咏梧一起前往农村。11月，江竹筠和丈夫来到下川东，在云阳、奉节等县联络暴动力量。12月，成立以彭咏梧为首的川东民主联军。暴动前夕，江竹筠返回重庆，请求临委增派干部。

暴动发动之后，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剿，部队失败，彭咏梧牺牲。江竹筠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之后，向临委报告。临委决定派人继续发动起义。这时，江竹筠毅然向党组织要求前往下川东，在丈夫牺牲的地方继续战斗。1948年2月，她再次来到下川东门户万县。由于风声太紧，无法展开工作，就暂时留在了万县。6月，江竹筠因叛徒出卖而被捕。特务知道她是下川东地委委员，又是起义领导人彭咏梧的妻子，所以对她特别重视，当天就使用刑具，进行逼供。

押回重庆之后，江竹筠被关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，俗称“渣滓洞”。在这里，她再次遭受重刑，但是敌人什么也没得到。她的坚强表现受到了全体狱友的尊重，在渣滓洞监狱人们称她为“江姐”。

1949年11月，在重庆解放前夕。江竹筠被敌人杀害。

## 殷海光

### ○临终岁月

自从“雷震”案发生以来，殷海光就遭到了台湾国民党的迫害。特工人员设计陷阱，想要抓捕他，没有得逞。之后，迫害变换了形式，舆论围攻、政治打压、生活迫害接踵而来。

1964年，台湾地区的一些舆论阵地开始声讨殷海光，他不断地被点名批评。殷海光对此重视不够，以为只是个人行为。他没有写文章反驳，希望事情自然平息。1966年，更大规模的舆论围剿来临了。蒋介石发起了“复兴中国文化运动”，意在用传统文化重新构建官方意识形态，打压和围剿“全盘西化”思潮。1967年，殷海光的著作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遭查禁，不久，国民党逼迫他离开台湾大学。

作为一个思想家，殷海光失去了发挥思想和言论的舞台。作为一介书生，他的生存发生了问题。殷海光想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谋生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他只得依靠朋友和学生的帮助，维持惨淡的生计。

晚年的殷海光，学术思想开始发生变化。在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这本书里，他开始一改反传统的思想，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价值。殷海光开始考虑自由主义的学理建构，考虑自由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结合，考虑中国道德价值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关系。评价自己20世纪50年代那些启蒙论政的作品，殷海光认为大部分作品有历史的价值，而很少有学术的价值。现在，殷海光想重新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发展之路（文化内新运动）。

1967年初，殷海光感觉到胃部不适，但是他只是吃一些药片顶一顶，希望能消除病痛。自从被国民党软禁在家以来，他除了读书以外无事可做，生活拮据，精神愁闷，此刻，他无钱也无精神去看病。4月，殷海光被弟子李敖带进医院检查治疗。医生诊断为胃癌。虽然早已不惧怕死亡，但是知道自己患上了癌症，殷海光还是很震惊。

病情的发展，没有像殷海光想象的那么坏，在切除掉三分之二的胃之后，他又活了两年。死亡的压迫暂时舒缓了，但是殷海光的心情仍旧没有大的转机。国民党继续不遗余力地迫害他。1967年5月，费正清聘请他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，但是当局没有批准。实际上，国民党特务整日在家门口盘桓，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。恶劣心情使他身体一直没有大的好转。

1969年的4月，殷海光读书、写作不能正常进行，他只好口述，由弟子记录。陈鼓应先后为他录下了59条语录。后来，这些语录被编辑成书，取名为《春蚕吐丝——殷海光最后的话语》。

6月，癌症复发，殷海光再次住院。他的脚、脸、腹开始肿胀，无力下床，病情从此恶化。殷海光并不想死，他说，“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，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，我有三十年宝贵经验，没有能写下来真可惜，这也就是我不想死的原因。”<sup>①</sup>8月，在为他的《殷海光选集》作序的时候，他加上了《志未酬》“志未酬，志未酬！问君之志几时酬，志亦无尽量，酬亦无尽时。”在和友人的一次谈话中，殷海光说：“现在天气太热，到10月以后再说，如果老天爷还能让我多活5年，我对中国文化必有贡献。”<sup>②</sup>

他没有活到10月份。9月12日，殷海光再次被送进台北大学医院。这是他最后的时光，到医院探病的人多起来。受他影响过的许多人，都来和他告别。殷海光的弟子韦政通、陈鼓应、张尚德、王小波开始筹划纪念仪式。李敖也送来了自己的《殷先生后事处理意见书》，谓遗体交给医院，全权委

<sup>①</sup> 见汪幸福《殷海光传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51页。

<sup>②</sup> 见汪幸福《殷海光传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49页。